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志愿服务运行与管理

■ 陆士桢 蔡康鑫

(中央团校,北京 100089;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要】当前,志愿服务日益成为广大民众追求精神寄托的一种生活方式,并构成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志愿服务的良性运行和管理,需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用管理学与社会治理理论等明确志愿服务管理体系的基本方向,并科学规划运行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国家体制对志愿服务管理体系的保障作用。在科学管理的同时,还需要围绕我国当前国家发展战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志愿文化优良传统积极推动志愿服务管理的本土化发展,实现志愿服务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

【关键词】社会治理 志愿服务管理 志愿服务运行 本土化

志愿服务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而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公共行为,它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一项综合、系统的社会事务,成为广大民众一种发展性的社会生活模式,一种人类精神发展的积极表达。在现代社会,志愿服务的内涵涉及的社会元素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越来越深入广泛,也越来越复杂多元。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多种理论视角来解读志愿服务的本源和内在规律。例如,人本主义范畴下的生命历程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建设和发展视野下的多元福利理论、福利服务理论;人的成长发展系统中的服务学习理论、人的需要理论;管理学角度下的社会治理理论、组织理论等。其中,管理学和社会治理理论视角下的志愿服务运行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势必成为发展新时代志愿服务的重要命题之一。

目前,我国进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应该说,随着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步入现代化,我国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志愿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纳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范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主题下,研究志愿服务运行、发展规律,探索统筹、管理志愿服务的科学体系,既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更有效发挥志愿服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在整个社会治理的架构中,由于志愿服务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所以,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其进行归纳和分析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现实。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宏观结构分析建立社会系统理论来识别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并探索实现社会系统功能要求的特殊社会结构^[1]。在社会系统理论中,社会要素之间的

收稿日期:2021-09-18

作者简介:陆士桢,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社会工作、青年与共青团、志愿服务等;

蔡康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政策、社会工作。

相互关系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本质,通过社会制度来维持,再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制度的作用。帕森斯将一致性作为理论基础建构了AGIL分析框架,即适应(Adaptation),社会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从而实现运行;达鹄(Goal-attainment),社会系统的目标确立,使社会运行有方向性;整合(Integration),协调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实现各部分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维模(Latency),社会系统在运行中暂停并能保持原有的运行模式,在重新启动运行后还能恢复之前的互动关系^[2]。以结构功能理论为基础,可以从三个基本视角来分析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志愿服务的运行和管理机制,以及体系的建构:第一,伦理价值追求,即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志愿服务建设发展的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第二,运行的要素及体系,即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运行发展的主体、结构、运行流程以及主要内容;第三,保障机制,即推动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政策制度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物资保障等。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运行和管理研究主要涵盖两大领域:一个是在社会整体建设中志愿服务的定位功能和体系机制建设;另一个是志愿服务本身的运行管理,包括组织动员、项目设计执行、志愿者队伍建设、督导评估,等等。本文将基于上述三个视角,以志愿服务的本质起源、发展规律、管理学等相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关论述为理论视角,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研究分析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志愿服务的运行与发展。

一、志愿服务良性运行与管理的理论背景

首先,志愿服务运行与管理体的建构必须认真研究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第一,要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3]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思考、研究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系的建设,涉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健全、民主法制建设、社会文明、公民参与、社会组织、社区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指导原则的规制下,通盘考虑,全面构建。第二,要深化管理理念,明晰价值内核。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备与传统的以政府管理为主体的治理体系不同的本质特征,其善治、共治和合治需要通过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同时,还必须通过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沟通方式的平行化、执行机制的自愿化达到国家管理与社会参与的最佳状态。这其中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对管理主体多元化以及公民民主参与机制的要求,是治理现代化的突出特征。这对于志愿服务运行与管理机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所以,建立科学合理的运行管理体系,把社会治理的现代理念和核心价值通过志愿服务传递到社会大众当中,就必须注重更新升华管理理念,明晰价值方向。第三,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的建构和健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4]。这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根本理念,是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方式创新的目标,也是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系建设的根本遵

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体系性的结构,是一个国家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5]。习近平总书记对现代化的治理制度提出明确要求,要“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6]制度、规范、程序、完备、稳定、管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社会各个系统现代化科学管理体系建设提出的重要标准和要求,应该成为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追求。制度体系是基础,科学运行是保障,提升志愿服务运行管理执行能力、专业能力,让更多的志愿服务管理者和志愿者拥有“一流的智力”,“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7],应该成为志愿服务运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方向。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志愿服务运行与管理的重要理论支撑是现代管理学。管理学也称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8]。管理有很多定义,例如,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罗宾斯认为,管理是通过协调和监督他人的活动,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完成工作;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等等。实际上,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管理活动可以看成是循从管理本质,从整体出发,通过管理架构、管理过程及管理方式的运用,确定发展改进思路,并通过结构创新,达到更高管理绩效的过程。管理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性。如被称为“管理学之父”的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原理”,强调用科学、非经验的方法研究管理活动,建立明确的量化的工作规范并将其标准化,挑选和培训员工,提高工作技能,获得更好的工作业绩;强调管理者做好预先的计划,建立明确的工作规范,对管理业绩负责,等等,这是对管理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的阐述,更是一些具体运用的规范,需要用一些工具和方法,例如运筹学、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9]。这个意义上的管理学,本质上是管理者和其他人或透过他人有效率、有效能地完成活动的一种过程和程序。又如,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管理理论被称为科层组织理论,是指通过职位来管理,而不是通过个人化的命令或通过世袭获得权力地位来管理,他提出的可以使行政决定更合理更有效的官僚组织模式在社会和组织结构建设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0]。实际上,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管理学在强烈的实践特点背后有着深入的学理和理论渊源。

一般认为,管理学有四大原理,第一是系统原理,现代管理的任何对象都是一个系统,都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评价、设计、优化、决策和实施,这是对现代管理的基本认知;第二是人本原理,即始终承认并确立人是管理系统的核心,管理活动应在对人的思想、感情和需要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第三是动态原理,即认识到管理系统及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运动变化的,应在动态中实施管理行为;第四是效益原理,任何有效的管理目标都是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这也是每一个管理主体追求的重要社会目标^[11]。纵观这四条基本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研究的是如何把握一个系统动态发展的过程与规律。正因为如此,一般来说,管理学的研究会具体到四个方面,第一,管理主体,即组织,包括国家单位也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第二,管理的行为和活动,包括五个方面的要素,即人、财、物、信息、时空;第三,管理的手段,如强制、交换、惩罚、激励、沟通、说服等等;第四,管理的过程,包括管理规则确定、管理资源配置、目标的设置与分解、组织与实施、过程控制、效果评估、总结与处理等环节。在这些具体的计划和行动背后,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基础理论和决策环境与决策程序、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是重要的支撑,这些支撑是管理学命题的认识论基础,也是管理行为的实践依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学最基本的前提和原理是对人性的假设,对管理的各种理论的阐述以及具体实践运作的规则、目标是社会效能,而起点和根本要素则是人。在人本属性、社会效能目标以及具体管理行为等诸多方面,现代管理学必然对作为一种社会综合事务的志愿服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要重视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对志愿服务运行与管理的指导作用。社会治理及其理论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根本意义上,它是随着全球化民主建设的浪潮对国家治理这一概念而提出来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社会治理定义为,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2]。对于社会治理的本质意义,罗兹形象地从统治的含义来解读,他说社会治理“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3]近些年来,各学科例如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其中的“新”进行了解读,尽管分析的视角不同,但善治、共治、合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追求和特征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善治”的核心追求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核心概念。虽然在传统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学研究中,“公共利益”的概念一直存在,但也一直并非核心概念。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公共利益”不仅是最重要的目标追求,而且必须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法规予以落实和保障^[14]。志愿服务运行管理制度化建设,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治理整体结构中实现善治目标的重要组成和体制保障。所谓“共治”,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强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是公共机构和大众,将社会力量作为治理的重要主体。“合治”则强调社会治理的基本运行特征,相关研究一致认为,社会治理运行模式的核心概念是网络、互惠、责任和民主等。如果说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追求是“善治”,那么实现公民参与、互动,建立公共领域结构网络化等的“合治”,则是实现根本追求的关键条件。志愿服务是社会福利经济水平的重要参与要素,具有重要的经济发展功能;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的实现有效、有序民主管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社会发展功能;志愿服务行为能够激发参与者的个体活力,具有重要的人的发展功能。这种根本性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志愿服务与现代社会治理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以现代社会治理的理论价值为依据,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运行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二、志愿服务良性运行管理体系的科学建构

积极明确的理念价值追求,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体系以及以制度化和专业化队伍建设为核心的保障体系建设,是建构志愿服务良性运行管理体系的基本任务,也是志愿服务运行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三个方面建构的根本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是国家颁布的志愿服务条例,核心发展方向要参照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要求。

实现志愿服务的有效运行与管理,必须明确志愿服务管理机制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即志愿服务发展建设的理念与价值追求。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学还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理念或称为指导原则和思想都是其核心和基础的部分。管理、治理理念的确立和提升,实际上是对管理的本质和基本概念不断认识并以此为理性建设管理架构,实施科学有效管理。确定志愿服务管理的指导思想,核心的概念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中心概念出发,我国新时代志愿服务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向同行”。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与志愿者亲切交谈,他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15]。这不仅意味着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代,志愿服务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体部署当中,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国家发展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表明中国志愿服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统一、步调一致、紧密结合;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系的建设必须以“同向同行”为基本追求,在“同向同行”这一大框架下搭建基本机制体系。第二,坚持社会文明建设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6]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主题中,提出了“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17]。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根本的功能目标,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传播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与人为善、平等尊重、互相帮助、无私奉献等精神,推动合作互助、互爱互信、诚信奉献的社会风尚的形成。第三,重视遍布城乡社区和基层的、广泛的群众性参与,全面推动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赞扬志愿者“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基层,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18]。2006年,国务院的文件中也明确指出要“培育社区志愿服务意识,弘扬社区志愿服务精神”。这些重要精神从同一个角度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实践特征。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广大公民普遍参与的社会行动,在基本追求上明显具有公共福利取向、问题取向和行动取向,而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更重视遍布城乡社区和基层的、广泛参与的群众性互助,这是一种广大人民群众随时随地可以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全面促进基础性社会建设的实践。第四,遵循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建构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色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制。必须强调党和各级政府对志愿服务发展的领导和主导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志联的贺信中明确指出,“给予更多支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19]。要按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求,不断强化组织动员机制、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项目运行管理机制等,加强具体执行制度的建设,以保障志愿服务社会功能全方位的实现。

实现志愿服务的有效运行与管理,必须高度重视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建设。众所周知,进入新时代以来,志愿服务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民众奉献爱心、参与社会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其推动社会文明建设、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在整个社会特别是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影响着志愿服务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例如,志愿服务的内容还不能够涵盖社会和百姓的全面需求;志愿服务项目的简单化、形式化不仅影响其效能,也影响民众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志愿者的奖励机制、培训体系都还不够健全,志愿者的综合素质亟待提高;志愿服务组织的执行力、专业化以及自律性建设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作为志愿服务基础性建设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志愿服务政策法规保障机制和畅通的资金支持机制尚不够健全,志愿者准入、服务需求与服务力量对接、志愿服务力量调配的机制还有待完善,完整有序的志愿服务与行政系统的协调体系还不健全等等。总之,制度化的、科学有效的志愿服务管理体系尚未形成,志愿服务尚未有效、有序地纳入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结构当中。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方向和要求,所谓制度化,除了规范化、有序化、固定化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概念,即过程。志愿服务运行发展体系包括两个层面,国家政府层面和志愿服务运行层面。无论哪个层面,实现制度化就是要把志愿服务相关事物和人们的行为纳入固定的、科学有效的模式之中,要通过相关的规范和体系,回答好用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志愿服务的现代效能,如何建构起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志愿服务参与共治的机制体系。这需要对志愿者和志愿服务本身作出相关的规定,同时

还必须进一步规范志愿服务,包括政府机关单位、社会组织、项目活动、志愿者,等等。必须通过制度性的规范,对社会的相关机构、相关部门、相关事务做出规定,具体解决好在社会建设发展的所有内容、机构、事件的运行当中志愿服务是否能够介入、在哪些方面介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介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规定保证有效介入和发挥应有作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就要求在政府层面,除了通过政策法规体系对志愿服务发展的相关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制度性的规定之外,还特别需要在具体运行方面,通过机构设置分工、具体执行体系建设、行政调配等多种手段,推进整个社会志愿服务的科学有效运行。例如,有组织是现代志愿服务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缺乏在总体上的布局以及制度上的保障和制约,不仅会失去志愿服务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且会带来各种社会的和个人的风险。所以,志愿服务的运行机制建设,如内容分布、项目布局、需求对接等体系的建设就尤为重要。在志愿服务的重大类型之一的救灾抢险服务当中,志愿者的资格准入、服务需求和志愿服务资源的协调对接,不仅需要政府有相关的规定,还需要有相关的机构或是被授权的社会组织承担具体的协调事务。而在志愿服务活动 and 项目执行的具体运行中,志愿服务的组织动员、志愿者管理、服务项目设计及运行统筹、服务流程管理的科学督导与评估体系建设、持续发展设计等,都需要科学有序的执行规范,需要在制度和体制上对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运行体系的建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志愿服务组织规范化建设,这需要在政府层面进一步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统筹管理,包括注册和日常的监督奖惩等。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数量、分布规模、服务内容、组织层级等问题进行统筹规划,这既需要在政策法规体系上不断建设,也需要在行政体制上有机构、职能、人员保障。

实现志愿服务的有效运行与管理,必须建构全面有效的保障体系。作为一种根本性建设,保障体系实际上是为志愿服务管理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一个体系,一种系统整合。从功能的角度,保障体系可以分为激励、制约两大机制,核心要素是法规保障、资金保障和组织队伍保障。一是法规保障。需要建立围绕志愿服务运行发展的所有方面的法规制度,并形成体系,内容不仅包括倡导的是什么,还必须突出在执行层面怎么办,在基本要求、流程及其他执行相关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建立稳定的资金保障体系。各级政府要逐渐把志愿服务资金支持纳入财政预算,给予体制上的保障,还要通过各种专项资金支持大型志愿服务组织和服务项目,保障志愿服务组织的快速发展,以及志愿服务活动的多方面需求。三是人才队伍建设。除了要进一步提高广大志愿者综合素质和提供多种服务的能力,根据百姓需求进一步扩大专业志愿者的队伍之外,还要特别重视志愿服务管理者队伍的建设,逐步建立专职志愿服务管理者的专业评定制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进志愿服务管理的专业化发展。

志愿服务良性运行管理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需要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同时也必须是每个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应尽的责任。

三、中国特色志愿服务运行发展机制的本土化发展

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运行发展机制,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命题:本土化发展。志愿服务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行为,志愿服务精神是世界各民族精神财富的共同追求,志愿服务文化包含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每一个国家的志愿服务都会因为历史文化、国体政体、发展状况等因素呈现

出不同的特色,所以,本土化是世界各国志愿服务发展都不能回避的主题。所谓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涉及价值观整合、制度融入、方法融合等多个层面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众多的、普遍被认同的外来体系、价值、模式融入本国文化价值和制度体系的过程^[20]。所谓“融入”,是指事物相互融合、混合成为一体,共同发挥优势、承担职能的过程,其中最核心和关键的部分,是文化价值的整合和制度体系的融入。

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在新世纪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联合国志愿服务组织等领导人多次称赞中国在大型活动服务以及普遍性的学雷锋活动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在党中央领导下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的必然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包括建构志愿服务运行管理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优势,坚持本土化发展方针。

首先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优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推进志愿服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跨越式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全党全国人民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力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面擘画了未来十五年的奋斗蓝图,构建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改革教育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发展的重拳,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坚守着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宗旨持续科学发展。可以说,新时代的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人民大众普遍有较高的幸福感;社会安全,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成效具有很高的认同度;人们的国家意识不断增强,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具有强烈的期望和充分的信心。特别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追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日益普遍和显性的必需品,不同人群精神价值的分化直接影响到个体和群体的生活质量,也影响着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现状,形塑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志愿服务不是为了贪图虚名,也不是为了做圣人,而是为了满足精神美好的需要,追求的是现代人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的积极生活与休闲方式,选择的是一种将个人的发展与他人的美好生活、与社会的公共事业相统一的社会行为价值指南。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实名注册志愿者达到2.09亿人,志愿者组织约108万个,发布志愿项目约589万个,遍布全中国的各个省市、地区。服务类别包含环境保护、社区服务、扶贫减贫、科技科普、应急救援、关爱特殊人群、大型活动等几十种,涵盖了医疗、教育、交通、文旅等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领域^[21]。通过志愿服务,不仅直接为社会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使广大志愿者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在积极参与中拓展了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融合,实现了家庭、职业之外的精神获得,将自我与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紧密连接在一起,进一步促进了个体的可持续全面发展。可以说,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人民大众满足美好生活需求、提升生活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依托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情和万众一心、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而奋斗的民情,坚持本土化,推进独具特色的、包括运行和管理的机制和体系建设在内的中国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其次是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努力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运行和组织模式。我国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全世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大型活动志愿服务以其广泛的社会动员、严密有效的组织协调、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不仅圆满地服务了国内

外各种类型的大型活动,而且也为世界范围内志愿服务的发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受到了联合国志愿服务组织和各国志愿服务界的高度赞誉。志愿服务活动在中国所显示出来的成效和优势,源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背后的制度之基、治理之道。这包括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指引和制度保障,包括中国社会长期建设中形成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根基的全体人民在精神、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和精神力量,包括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和独特的社会治理特点与优势。以志愿服务运行的重要环节志愿者的组织动员为例,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普遍单纯依赖社会动员不同,我们在社会动员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行政体系的统领协调作用,而且特别重视群团组织的先锋和骨干作用。在中国社会组织中,群团组织作为执政党直接领导下的社会组织,无论在社会学意义上还是政治学意义上,都从体制机制上和执政党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在组织动员相关领域的群众方面具备一般社会组织不具备的特殊力量。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志愿服务组织动员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4年,在共青团的指导下,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的志愿服务社会团体——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这是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标志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近30年来,青年志愿者服务一直在共青团组织的统筹和引导下健康蓬勃地发展,成为我国志愿服务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先锋和骨干力量。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我们国家强大的行政力量以及行政体系。无论是计划统筹,还是人力调配,或是物资资金支持,政府各级行政部门都发挥了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各个系统的职能部门也都通过行政力量和系统支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创新志愿服务项目,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志愿服务品牌。如中宣部文明办的以志愿服务为重要形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活动,文化系统的“文化志愿者基层服务年”系列活动,司法系统的“普法志愿服务活动”,体育系统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等等,行政体系和系统支持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充分发挥行政体制的优势,发挥群团组织的特殊社会功能,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志愿服务本土化优势,也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

最后是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建构独具特色的中国志愿服务文化体系。文化是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支撑,也是志愿者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称赞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时指出:“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22]“志愿者”“志愿行动”“志愿服务”等概念源于近现代西方社会,但是志愿服务精神、志愿服务理念在中国有着坚实并独具特色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本土化的中国志愿服务文化价值体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中国几千年来来的文化传统价值,是中国志愿精神最为厚重的文化底蕴,与当代志愿服务价值同向、精神相通。二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价值。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3]。共同价值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重要精神内涵,也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国际化与时代性的重要表现。三是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价值追求。雷锋精神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共产党人的精神情怀,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文明,如崇高理想、人民情怀、奉献精神 and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基础和源头,体现了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文化的高度自信。认识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把志愿服务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当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运行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进一步探索志愿服务组织运行方面的本土化模式,实现志愿服务在经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全面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目标,是志愿服务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定位的要求,也是志愿服务自我改革创新s的必然之路。运行与发展模式的探索,机制和体系的建设,既要求有进一步的创新,也要求有对原有体制的革新;既需要发动政府相关部门重锤重力,也需要全社会不断探索、守正创新。此事任重道远,责有所归,需众志成城,齐心协力。

[参 考 文 献]

- [1][2]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91、192页。
- [3]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https://www.12371.cn/2019/10/31/ARTI1572515554956816.shtml>
- [5] 许耀桐:《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论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 [6]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 [7]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载《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 [8] 刘汉一 陈谨详:《管理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 [9] 李新春 胡晓红:《科学管理原理:理论反思与现实批判》,载《管理学报》,2012年第5期。
- [10] 孔繁斌:《行政管理理性化的追求与困境——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 [11] 杨 锐 殷晓彦:《管理学原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页。
- [12]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3.
- [13] R.A.W.罗茨:《新的治理》,木易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 [14] 冯宪芬 王 萍:《从法学视角探析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现状》,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 [15] 《习近平在天津考察》,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18/c64094-30576928.html>
- [16][18][19] 《习近平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384.htm
- [1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
- [20] 陆士桢 王志伟:《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双重机理及其实践路径》,载《新视野》,2020年第1期。
- [21] 《慈善蓝皮书:经费不足成志愿服务组织最大挑战》,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9574493615247.html>
- [22] 《战“疫”中,习近平强调这样的中国精神》, <http://news.cctv.com/2020/05/06/ARTI1CKQp0onyfPDw4ncG1o2200506.shtml>
- [23]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责任编辑:王俊华)